

论古希腊神人关系与城邦政制法律的演变

魏钟毓¹ 杨朝燕²

(1.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2.华中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以尼采的“精神三变”——骆驼、狮子和婴儿为隐喻,通过分述古希腊神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神人亲密同形、神人对立交争、神人和解互融,探求了三个阶段所产生的原因及神人关系的历史演变对古希腊城邦政制、法律及社会生活的影响,从而追溯了古希腊文明建制和哲学的诗性渊源。

关键词:尼采;精神三变;古希腊文明;神人关系;城邦政制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713(2017)05-0631-05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提到过“精神三变”的理论,并用骆驼、狮子和婴儿来譬喻人类思想发展的三个境界。沙漠之舟骆驼负重而踽踽前行,森林之王狮子健壮而铮铮雄踞,赤子之心婴儿纯粹而富于创造。骆驼、狮子和婴儿分别代表身负传统精神压力,勇于破坏传统以实现自我解放,以及破坏传统后重建价值的精神三境界。“精神三变”理论为理解古希腊文明中神人关系的几个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解释。“哲学,是一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1]4。探究神人关系,可以一窥神学作用与古希腊社会的心灵力量和古希腊哲学启蒙的背景。正如让-皮埃尔·韦尔南在《神话与政治之间》一书中所说,“希腊人眼中有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圣”^[2],希腊人与希腊神话中有关诸神的一系列诗性的记忆,往往能够成为触发社会演变的精神力量。

一、骆驼——神圣与人性的世俗化

希腊的初始文明模式,神的意识使人与神有着特殊亲密的关系^[3]0。当冰河时代结束,远古的先民在困苦的生存流变中愈发意识到,仅凭自身的智力和思考力,已经无力理解身处的世界。人类开始寄托于一种自创性的外界解释,即神灵和神性。神性解释由此成为人类的精神保险和背景支援^[3]。以“神”来阐述和理解世界,成为人类在生存发展中的心灵慰藉,并以此摆脱与自然力抗争时的困惑与绝望。

(一)神人同形与神灵规则的产生

随着游吟诗人的传颂,神的意识被上升到一种文化认同,一种被集体认可的对世界的全新解读,神话由此在古希腊的土壤中孕育而生。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凭借初民的想象,拥有了凌驾于自然山川和人类社会之上的神圣的力能,并渗透在古希腊初民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中。18世纪的人类法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中说道,“人心的本性使人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种效果上去”^[4],自然对象的人格化、拟生化启发了古希腊初民的想象。太阳与月亮、白天与黑夜、清泉与森林、水与火都被赋予了神圣的维度。神性植入到了每个平凡人的个人体验中,人事与神事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从原始自然神(混沌)到巨人神,再到以宙斯为代表的奥林匹斯神系,各神系的衍生与嬗变,反映着古希腊人类文明模式的逐步进阶。至最后,“神祇完全是人性的”,而“奥林匹克的神主要是征服世界”^[5]40。神话中的神由自然力的象征逐步演化为社会统治征服力的象征,并随着先民生活经验和实践需求的增加而逐渐人格化、世俗化和政治化。

在神话重心由自然力转为社会征服力的同时,神话中神界的建构愈发趋同于人间理想化的社会建构,并成为古希腊城邦法治和政制神圣源头。战神山议会中进行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审判、复仇女神的对弑母犯刑事追究和雅典娜开创的陪审团裁决。这些无一都彰显了诸神对正义、赏罚和法律秩序的神圣理解。神灵

收稿日期 2017-06-25

基金项目 清华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SRT)项目(1722S0356)

第一作者 魏钟毓(1995-),女,清华大学本科生,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通讯作者 杨朝燕(1970-),女,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从事跨文化交际与翻译研究。

规则,便在这样的全新的社会建构、人对神的世俗化理解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随着神的意识的产生,初民衍生出了对秩序、规则的渴求。在先民的社会理想主义不断发生膨胀之时,诸神逐渐被解构为理想社会的缔造者和秩序的制定者。至此,神最终化为规则和制度^[5],成为古希腊社会建制的神圣之源。

神灵规则作为人间秩序之源,关照、审察并干预人间法治的稳定性和正义性,并被世俗首长在维护法制永恒稳定性的过程中所利用。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斯巴达政制之父吕库古(Lycurgus)召集全体斯巴达人,在阿波罗神殿令女祭司宣读了神谕。神谕中自颂为“诸神所钟爱的人,不是凡人,而是神”,并藉此获得了神灵规则下的神圣权威。于是,立法如顺水行舟,一令万从,改革的旗帜在斯巴达土地上自由地飘扬。他在立法过程中,谨记神谕,创立了一套有关元老院代议制度、经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完整法治体系。吕库古给斯巴达带来的特立独行的风骨,使其铮铮伫立在古希腊文明模式之巅,他亦在古希腊人的英雄崇拜中不断神化。

(二)宗教神与城邦法的“契约”结盟

在神灵规则和神谕的渗透力下,宗教神开始进入人类生活。城邦文化与神灵规则水乳相融,使得人们开始向往趋于稳定的信仰共同体,而对信仰共同体的需求则刺激了宗教神的诞生与繁荣。索尔姆森在《柏拉图神学》中曾说,“希腊神祇,依他们自身的性质及性格,参与了希腊文明的实质性发展,而公元前五世纪的诗人和思想家们反思其性质的诸神乃希腊城邦的守护者和神圣象征”^[6]。古希腊的“德谟”(Demo,即村社)和大小城邦都逐渐衍生出了专属的神和英雄。因而,城邦成为宗教圣地和诸神的栖息之地,而诸神则相应地运用神谕和神力给城邦提供保护。

城邦保护神的存在拉近了人性与神性的心灵距离,促进了城邦法与宗教神的联合。“只要一种宗教和一个帝国政府结合在一起,政治的动机就会大大改变宗教的原始面貌”^[13]。而宗教神与城邦的结盟与忠诚,也是两者签订神圣契约的过程。城邦从宗教神那里获得土地、安全和生存保障的“准许证”(Charter),宗教神则获得城邦的精神信仰、崇拜、权威和尊重。而见证这项神圣契约签署的则是人与神的纽带——城邦法的制定。城邦法从神那里接受了恩典,因此犯法就是亵渎神灵^[13]。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创建了德谟公民政治,促成了宗教神与城邦法制的结盟。克里斯提尼开创的结盟卓越超群、别具匠心,展现了政治空间和时间上的双向结盟^[5]。在空间上,他特意环绕德墨忒尔神像,以神祇为中心建造了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有机地以神为纽带串联了平民政治舞台和贵族政治舞台。神的权威赋予了平民和贵族坐而论道、平等交流的政治空间和精神空间。在时间上,在发现阴历无法形成强大的政治统一力度之时,克里斯提尼用布莱坦立法(Prytan Calendar)取代了阴历,以古希腊宗教中心德尔菲为中心确定了子午线,保证了宗教神在公民政治时间上的渗透力和统一性。通过时间和空间上的双向结盟,克里斯提尼有机地将城邦与神界、人与神结合在一起,而神的信仰则促进了城邦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城邦法的变革与演化。

如“骆驼”蹒跚前行,希腊人依仗神灵规则和城邦法为希腊城邦矗立起了一座牢不可破的宗教堡垒。

二、狮子——神圣与理性的解构

自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城邦与诸神的联合随着神人关系的恶化而出现了裂隙。智者学派引领的启蒙运动,开始步步解构神话中诸神的德性与正义性,启发人们去反观、质疑和消解神话中粗糙的理想社会建构。

(一)神人关系的危机与宗教神神圣性的消解

公元前五世纪末的启蒙运动促发了古希腊人的灵魂转向——人开始不再仰望于神,而逐渐体察到自身的理智力量。灵魂的转向让古希腊人对诸神拥有的社会政制和法制的垄断权力愈发质疑,而日益增长的心智让人们产生了与神分享这种垄断权力的欲望。这种权力意识的觉醒在人神意志冲突的时刻表现得尤为突出。《安提戈涅》中克瑞翁与安提戈涅在对埋葬安提戈涅哥哥尸首的议题上出现了分歧,克瑞翁认为应该按照人的法规和人性化的要求来处理俗务,因此,掩埋尸体是公民的个体义务而非城邦的责任。他讽刺诸神掠夺神圣的土地,践踏神圣法律。其内心深处产生了独立于诸神之法的“自治”意识,对传统意义上诸神支配私人生活的决断地位发出了质疑的呐喊。

宗教神作为城邦的保护神和精神代表,一直凭借其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不偏不倚的正义性和操行纯洁的德性来强化自身垄断地位的合法性。然而,宗教神与城邦之间的“契约”同盟在启蒙运动时期也在质疑声中被撕毁。

对诸神的反伦常、非道德行为的揭露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智者的潮流。在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中,奥林匹斯神的名誉遭到了攻击和批判,辩论、诗歌和戏剧中充斥着对神话式宗教神的质疑。在质疑的潮流中,公元前五世纪的悲剧诗人表现得最为激进^{[5][9]}。他们解构了传统神话中刻画的一个个德高望重、包元赋德的诸神形象,机巧地揭露了诸神伦理道德和正义感的匮乏。戏剧《赫拉克勒斯》中,悲剧诗人欧里庇德斯谴责了宙斯的冷漠无常、荒淫无度,嘲讽了赫拉妒能害贤、充满敌意。戏剧中充满正义感的“凡人”安菲特瑞翁,在向宙斯祈求徒劳后,发出了愤慨的吼叫,“你尽管是伟大的上帝,我,一个凡人,在价值上胜于你”^[7]。戏剧《伊翁》中,尘间的少女被阿比罗强奸后生下了伊翁,然而阿波罗却丢弃婴儿,任其在田野中自生自灭。多年后,伊翁发出了悲惧的呐喊,“神是真实的,还是乱示是虚假的呢”^[8]。由此可见,这般对神直截了当的控诉在神人关系的发展史中是先验的和革命性的。启蒙运动开启民智,促使凡人第一次将自己与神放在一个对比的平台上,并从常识、价值观和伦常的角度担任了诸神德性的审判者。凡人在比较中参悟到诸神之间的通奸与背叛、遗弃与沉沦,均无异于凡人,甚至卑微于凡人。人类在比较后的心智觉醒,使得诸神的神圣性极大地被削弱。

除了对诸神德性的批判,人们对诸神正义地位的消解也对神与城邦之间的同盟契约起到了摧枯拉朽般的毁灭作用。在古老神话中,诸神往往盘踞终审权,掌握最终主宰者之席,在法律判决中有着垄断的治权。然而,启蒙运动时期的智者对神判的有效性和正义性不予苟同。希腊人将目光从神话虚构的乌托邦转移到现实的图景,发现施暴者作恶多端仍平安无事、贵祥尊荣,善良的贤人却忍受着病痛、贫穷、背叛和灾祸的煎熬。智慧女神雅典娜手中的权杖和正义之神狄克的明眼,不仅无法调和人类事务中的不公平分配,也无力惩恶扬善。现世中公正报应的缺失、不幸体验的泛滥都使人们质疑诸神的不善和无力。《特洛伊妇女》中的赫卡柏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喟叹,“神们呀!——我为什么要呼唤神们?我早就向他们祈祷,可是他们哪里肯听”^[9]。在神话中的理想王国幻灭之后,所谓的神圣的运作和正义从古希腊人的观念世界里渐渐淡出,神人关系危机显现。

(二) 理性主义的崛起与世俗立法者的构筑

神人关系的对立造成了人与神的分裂。当神的形象不断被丑化和妖魔化的同时,人类在自己身上挖掘出理性、正义和勇敢等诸多“超神”的宝贵品质。至此,人类逐渐脱离了对神逆来顺受的“骆驼”状态。

西方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从而彻底将人类权力意识的觉醒领入了最高峰。“尺度”一词,反映了古希腊人渴望拥有对人类事务的管治、测量和最终评估的权力。他们不仅对诸神本身掌握了审判和裁决的最高权力的传统进行声讨与质疑,也对所谓“通神的”政治家滥用转述神圣法的权力感到极为反感。历史上的黑暗暴君克里底亚也曾承认,“宗教乃是一些狡诈的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骗人把戏”^[10]。克里底亚也曾戏谑地将城邦法称作宗教神把玩下的恐怖的统治工具和震慑人心的手段。以克里底亚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批判性地检视城邦法的神圣权威,消解城邦法的法制效益。

在对诸神的批判浪潮下,固有秩序的混乱局面让启蒙运动的智者和诗人们不得不重新寻找理想的法治构筑模式。为打破诸神垄断法治和社会生活的局面,治权私人化的构想由此诞生,而人类治权的代言人则是世俗立法者。由于启蒙运动中时代思想家的集体解魅获得了广大城邦民众的拥簇,人们所构筑的理想社会中,世俗立法者和治权的掌握者不再是城邦中的通神人和神的代言人,而是理智与知识、技术权威的最高首长。然而,囿于时代限制,这个大胆的想法虽具有先验性,却因为完全与神性的割裂而缺乏法治的权威根基。

如同“狮子”,一些革新者在古希腊启蒙运动时期对神圣传统施加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大胆而革命的举动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神人关系,撕毁了宗教神与城邦法之间的契约联盟。

三、婴儿——神圣与法治的再降临

在启蒙运动的后期,一些智者开始理性地策划“狮子”对传统解构后的重建工作。在传统的废墟上重建一种适宜城邦发展的政制与法制体系,是一项难上加难的工作:其一,由“狮子”主导的解魅活动和进步思潮没有

顾及后事,即没有建立神人分裂后新的权威基础以重建城邦法律秩序;其二,反启蒙运动的老旧派仍然怀抱一本古老神话,四处游说步道,企图还原神统天下的秩序,原有的既得利益者“通神人”仍然滥用解释神圣法的力量,蛊惑民众。缘此,一些意识到理性主义狭隘性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新的社会建制的模式。

(一)净化宗教神:神去人格化

在探求建制模式的过程中,智者逐渐了解到,宗教神是社会法制的权威力量之源,并开始汲汲渴望于重塑宗教神的形象以维系古希腊城邦的精神纽带和法治秩序。在启蒙运动中,宗教神失去了人们的信仰基础,但一些智者发现,人们对宗教神批判性揭露是被“神人同形同性论”操控、异化的结果。

最初提出这个观念的是古希腊著名的哲人、诗人克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73年),他在《残片》中曾尖锐地嘲讽了荷马史诗中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并指出,凡人将自己在道德上的堕落归于诸神,错误地责备了诸神将不幸降临到他们身上。他甚至讽刺说,“如果牛、马和狮子有手,能用手作画,能做人能做的工作,那么马则画马形为神,牛则画牛形为神,让神的身体和它们自己的身体一般”(辑语15)^[11]。因此,他认为神话中诸神的非道德性和非正义性都是人为附会的,是凡人将自身的恶习和丑行强加在诸神身上的。于是,他以一个游吟诗人的身份,开创了对神的全新认知。他认为,神是不具备人格化的形象和性格的,神是纯粹的思想,并以此支配着这个宇宙。色诺芬尼让神从人固有的形态和心灵中抽离,成为了纯粹的、永恒的和神圣的心灵。因此,在他心中,神不仅拥有道德上至高的善,还掌握最纯粹的知识、力量和技术,从而拥有了最高的治权,是人间权力最大的审判官。以克塞诺芬尼为代表的智者通过对神的去人格化的解读净化了神的形象,重塑了宗教神的神圣性,为日后对神的高层次改造提供了精神基点。

(二)哲学的改造:人神关系和解

为了克服理性主义的狭隘与偏激,软化反启蒙思潮的冲击,部分智者开始探求一种对神人关系的全新阐述,试图用理性的哲学视角重塑神话中诸神的形象。柏拉图的新神学则开创性地促成神人关系的和解,促成了宗教神与城邦政制及法制的再次联盟。

柏拉图从“狮子”视角中获得了新神学建立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悲剧诗人的戏剧分析(如前文提到的《安提戈涅》),柏拉图清醒地意识到,“人试图以否定神、征服自然的方式从自然中脱颖而出,或者人期望彻底地依赖于神、无力地躺在自然上,都是错误的”^{[5]301}。于是,柏拉图在两种观念中找到了哲学的折中之道,即用哲学革新传统宗教,而经改造的宗教神学则与城邦政制、法制可以进行二次联盟。他认为,由于人类事务自身缺乏自觉的规范,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宇宙力量来塑造城邦法制、政制所需要的秩序范式。而这种宇宙力量就是诸神之力。因此,一个好的城邦法治需要合理的神学作为秩序之源和指导力量,而只有哲学,才能塑造一种城邦法治所需的合理神学。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试图用“神学的政治伦理化”对古希腊政制与法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在教育上,他讲究神话与政治教化相结合,他主张通过“有益于教育的”神话对儿童的德性发展进行教化,将诸神打造成契合未来城邦卫士与统治者的发展标准的完美道德模范。经过哲学改造的神话被放置于政治背景下,将诸神包装成“善”和“美”的结合体以进一步恢复宗教神的名誉,神话也以此作为教育课本渗透在儿童的文艺教育中,为城邦法制与政制培养出一心向善的德性公民。

在法治上,柏拉图深刻地意识到,黑暗而腐化的宗教已经无法作为治权的最高掌握者,更无力分配正义,诸神可以为献祭和贿赂所打动,他在《理想国》中谈到,诸神给不义者安排的生活比正义者的生活要好。在描绘了黑暗的宗教图景后,柏拉图试图用哲学来净化宗教神,把正义的分配权和最高治权从宗教神手中夺走,同时赋予了宗教神正义的守护功能。然而,人类政治家囿于自身生活经验的不足,难以成为知识、技艺的最高掌握者,因此无法掌握最神圣的统治术。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指出城邦法仍然需要神学基础,但这并不表明是“无法而治”^{[5]412}。相反,法律的作用尤为突出,法律是神学领域与人类生活领域中的纽带,模仿神制定法律,才能使法渗透了神学的宇宙秩序,并以此教化城邦公民。法律的权威性正是在于与诸神的契约同盟关系之中。由此,经过哲学改造的宗教神在一种新的法制基础上重新降临城邦,城邦与诸神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新的哲学基础上得以恢复。神重新成为了城邦政治家重塑秩序的完美典范。

如同“婴儿”降临,新神学、新哲学为神人关系注入了新的血液,宗教神与城邦法同盟得以重建。

在古希腊神人关系的发展阶段中,神与人紧紧“捆绑”在一起,在古希腊神人关系发展的“骆驼”——“狮子”——“婴儿”三个阶段,城邦政制与法制一直保持与诸神之间的微妙关系:从相互忠诚到相互利用,从分离割裂到重塑同盟。由此可见,诸神与政治、法治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相辅相成、共融共荣。神与人之间,爱恨共存,共同谱写了古希腊法制与政制的恢宏史诗。

参考文献

- [1]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著,余中先译.神话与政治之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72.
- [3] 江山.法的自然精神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07.
- [4] (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83.
- [5] 肖厚国.古希腊神义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6] FRIEDRICH W.SOLMSEN.Plato's Theology[M].Ithaca and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42:4.
- [7] EURIPIDES.Heracles[EB/OL].(2014- 12- 17).[2017- 02- 21].<http://ebooks.adelaide.edu.au/e/euripides/heracles/>.
- [8] (古希腊)欧里庇得斯著,罗念生,周启明译.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57.
- [9] (古希腊)欧里庇得斯著,罗念生译.悲剧二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04.
- [10] THOMAS G. ROSENMEYER.The Family of Critias.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J].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1949,70(4): 404- 410.
- [11] 娄林.克塞诺芬尼的哲学与诗歌[J].江汉论坛,2015,(6):75- 79.

The Evolution of the God-man Relationship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Law in Ancient Greek City-states

WEI Zhong-yu¹, YANG Zhao-yan²

(1.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Hube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three spiritual metamorphoses proposed by Nietzsche, namely, the metamorphoses from camel, lion to infant as metaphor,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elaborates the three stages which the god-man relationship went through in ancient Greece (namely, intimacy,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and makes a probe into the reasons why such development stages occurr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god-man relationship and the impact the evolution produced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law and social life of the ancient Greek city-states, thus tracing back the poetic origin of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Nietzsche; three spiritual metamorphoses;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god-man relationship; city-state political system